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日本明治政治小说因素

寇振锋

内容提要 梁启超在日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与日本明治政治小说之间有着不解之缘。本文主要考察《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实”和“虚”对梁启超亲手翻译的《佳人奇遇》以及与其相关密切的《经国美谈》、《雪中梅》等日本著名政治小说中的“实”和“虚”的借鉴。

关键词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 明治政治小说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始载于 1902 年 11 月由他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创作于日本的中国首篇政治小说，它在中国近代小说开创期所起到的作用已为诸多学者所首肯¹，在此无须赘言。梁启超既要写小说，就必然应该考虑到“实”与“虚”的问题。虽然梁启超并不是地道的小说家，但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并未简单地摹写社会上真实的人和事，而是运用了丰富的想像，补充了人物事件中的不足的环节，而且他已经认识到构筑在现实基础上的虚构才具有真实感，因此，他在《新中国未来记》这一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实”与“虚”的艺术结合。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概要中就预先对该小说所运用的创作手法有过明确的表述：“全用梦幻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²很显然，他对小说中“实”与“虚”的结合煞费苦心。梁启超在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之前，曾多次极力盛赞明治政治小说³。那么，梁启超的“实”与“虚”结合的手法又与他所接触的并大加赞赏的日本政治小说有何关联呢？

本文就《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实”和“虚”的描写与明治日本政治小说之间的关

系加以探讨，从中阐述梁启超是如何借鉴日本明治政治小说中的“实”与“虚”，并使其融入自己的政治小说之中的。

一 《新中国未来记》与《佳人奇遇》主人公塑造上的“实”

1898 年的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逃往日本的船上倍感无聊之际，有幸从船长那里借得一本日本著名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借此消遣解闷。就是这个偶然的机

会，使梁启超对小说中的流亡志士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并促使一心救国的他决心将该小说介绍给国人，于是在船上便开始边阅边译。

梁启超到达日本之后，更加认识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认识到正是由于有一批寄托政治思想、以政治宣传为目的政治小说日本的政界才得以进步⁴。这种触发无疑再次点燃了流亡在外的梁启超一心救国的渴望之情。同年 12 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从第 1 册便开始连载他亲手翻译的《佳人奇遇》，并在《清议报》第 1 册上发表了第一篇政治小说理论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

《佳人奇遇》的作者东海散士，原名柴四朗，东海散士为其笔名。柴四朗出身于会津的藩士家庭，早年在藩校学习汉学，在他十六岁时的 1867 年，政府军攻击会津城时，除了十岁的弟弟五郎以外，全家男子都参加了这场战斗。次兄在战斗中死去，其余人被俘押往京城，并且全家女子中除了远嫁的姐姐外，祖母、母亲、其他姐妹也均在官军进城时自尽身亡。柴四朗在饱含屈辱的俘虏生活后，在知己的推荐下于 1879 年赴美国留学。

其实，《佳人奇遇》就是柴四朗亡国身世的写照，作者首先将自己塑造为小说的主人公，因此小说的真实性自不待言。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一样，该小说“几乎都是以作者自身的经历、行动为轴，在细微处穿插虚构，用这一形式来展开故

事。主人公东海散士的立场，与作者东海散士的会津藩士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⁵因此，作者幼时的经历，以及对日本现状的忧虑等都体现在小说之中。主人公东海散士从小说第1卷的1882年在美国费城与幽兰、红莲相遇，到第9卷结尾处的1884年12月经墨西哥，从旧金山乘船回国，这些时间与作者柴四朗去美国留学以及归国的时期基本是一致的。在第10卷以后，主要为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从第11卷至第14卷以及第15卷前半部分，全部是作者作为谷干城将军的秘书官考察欧美时所记载的旅行见闻。小说一共为十六卷，以考察欧美为舞台的部分就有五卷，几乎占整个小说的三分之一。第15卷描写的是考察结束归国后发生的反对修改条约运动。第16卷是以清国问题及朝鲜问题等为小说背景，记述的是东学党事件以及三国干涉归还辽东等现实问题。这些小说内容与作者本身的行动及其政治主张几乎都是吻合的。关于这一点，通过当时报纸的记载也可窥见一斑。1892年1月，柴四朗成为福岛县第四选区的候选人，2月正式当选为议员。当时的报纸上载有柴四朗的逸闻：“东海散士，内地会津之候选人。某日在讲述政治上之意见时说：‘我之意见，与《佳人奇遇》第八卷相同’。用自著之小说代为宣传，亦奇也。”⁶可见，考察归国后所著的《佳人奇遇》完全是柴四朗身边所发生事件的实录，小说正是他本人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佳人奇遇》完全是自传式小说，其小说中的“实”的成分已是不言而喻了。

《佳人奇遇》这种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一致所带来的真实感，必将影响到亲手翻译该小说的译者梁启超，致使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运用了同样的手法。关于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二人的实像问题，陈平原即据以认为，黄李二人实际上代表了梁启超的两个方面⁷。

梁启超以倒叙的形式，在小说第3回才回顾主人公的身世，其大意如下：黄克强原为广东琼州府琼山县人，父亲黄群本系统学老儒，从小受南海朱九江先生之门。后来回到乡里，开塾讲学，而黄群又是黄克强的老师。黄群打发儿子和得

意门生李去病二人去英国留学，临行前送给黄克强一部《长兴学记》，以勉励其立身治事。黄李二人在上海时务报馆又遇到了浏阳谭先生嗣同，正著成《仁学》一书，于是抄了一部与李去病一路细读，此时的黄克强显然有梁启超自身的影子。在小说第3回黄李二人的大辩论中，李去病又成了梁启超的辩护人。因此，黄克强、李去病二人应该就是梁启超的分身。换言之，梁启超与柴四朗一样，让自身走进小说之中，主人公自然就成了自己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关于《新中国未来记》这篇小说，其实梁启超酝酿此书的写作已久，“余著此书，五年于兹矣”⁸。从时间上来推算，似可表明梁启超在流亡日本途中的军舰上边看边译《佳人奇遇》的同时，即已经立志创作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小说了。也就是说《佳人奇遇》对梁启超的影响和刺激始自其来日途中。

《新中国未来记》的自传性倾向，其实就是要强调小说中“实”的成分，使小说达到“不复觉其为寓言”的效果。这与柴四朗亲自走进《佳人奇遇》之中的手法毫无二致，进而言之，显然具有一定的模仿痕迹。

二 《新中国未来记》的“史笔”与《经国美谈》《佳人奇遇》

下面我们看一下与梁启超密切相关的另一篇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经国美谈》的作者矢野龙溪同样在小说中强调“实”的成分。虽然梁启超并未亲手操刀翻译该小说，但梁启超与矢野龙溪有过密切交往⁹，译者周逵又是追随乃师梁启超而东渡日本的，而且《经国美谈》又是登载在梁启超自己所创办的《清议报》上，因此，在小说的翻译过程中，梁启超都极有可能是参与其事的。也就是说，《经国美谈》对梁启超的影响的大前提应该是存在的。

位于小说篇首的《经国美谈凡例》¹⁰中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此书依据希腊正史中著名实事，从诸书中纂译辑成。其大体骨子全为正史。故将本篇正史大要

同时，矢野龙溪还在小说中频繁标明引文出处。例如第1回结尾处夹注为“以上诸名士之功绩、极其姓名等依据慈氏、俱氏希腊史”；第2回有“‘イ’一节为俱氏希腊史”；¹¹第3回有“‘ニ’一节为须氏希腊史”，“巴比陀走阿善一节为俱氏、志氏、慈氏希腊史”等等，类似标明出处的地方随处可见，尤其前编较多。当然，未标明之处意味着为作者的虚构。虽然在汉译本中这些“凡例”、“引用书目”以及文中所标明的出处等等均被省略，但这种重视事实的形式，对梁启超来说不能不感到新奇，甚至受其影响。并且，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所载的第一篇小说《洪水祸》中标明史实出处的手法就是模仿了《经国美谈》¹²。

关于《经国美谈》标明出处的作法，日本学者认为，“龙溪尊重正史和史实的主张在序文和凡例中已经表达出来，这无疑是出于对明治初年尊重实学之风气的考虑。”¹³《经国美谈》中“实”的成分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国美谈》本身就是一部通篇运用“史笔”的手法来描写的。小说第1回实际上就是“楔子”，此处作者通过一位六十余岁的白发老教师在学堂上为一群少年讲史来展开故事情节。这些孩童就是少年立志时期的小说主人公们，老教师通过学堂一角的两座英雄雕像给他们讲述了两个英雄的事迹，一个是舍身救国的格德王，一个是铲除奸党恢复民政的士武良。老教师的谆谆教诲的史谈，为小说埋下了伏笔。很显然，作者矢野龙溪是想用史谈的方式来感动青年读者。

虽然《佳人奇遇》并没有采取注明出处的作法，但是正如日本学者平冈敏夫所指出的一样，《佳人奇遇》的私小说性质和《经国美谈》标明出处之功具有“等价效果”。也就是说，《佳人奇遇》“由作者自身来保证，与正史事实产生了等价效果。”¹⁴并且《佳人奇遇》中讲述了波兰、埃及、印度等诸多弱小国家的衰亡史，同时登场人物的身世又是一部本国的衰亡史。佳人幽兰身上就是一部近世西班牙的衰败史，佳人红莲身上也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史。另外，东海散士及中国人范卿身上又都是一部流亡史。小说第3卷，通过骨数斗将军之口，讲述了波兰的灭亡史。又如第6卷里，通过主人公东海散士和佳人红莲看到一本新杂志上载有埃及亚刺飞侯的檄文，于是红莲给东海散士看了一本《埃及惨状史》，小说通过这本书开始介绍英法对埃及的干涉，外债以及欧洲人做官的弊害等埃及的惨状历史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中讲史的手法，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史笔”法。梁启超同样是通过孔觉民之口讲述《中国近六十年史》的形式，来展开小说的全篇。为了使读者得到一种具有讲史的真实感，梁启超便按照史书的体例，划分六大历史阶段，作为全书的大纲总目。

对此，狄葆贤特意在眉批处提醒读者到：“此六时代，殆中国必要经过之阶段，读者细玩之。”显然，这种“史笔”的手法足以证明小说中具有“史”的真实感。夏晓虹注意到，梁启超的这种“史笔”法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不同，但她又认为梁启超是借助了中国传统的“史笔”手法¹⁵。但笔者认为，这一手法的运用在中国近代政治小说中尚属首次，综合来看，梁启超的这一手法借自中国古代小说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在明治政治小说上所体现出来的日本这种尊重实学之风对梁启超影响的可能性倒是难以否认的。

另外，梁启超在小说中，还采取了与《经国美谈》一样标明事件出处的手法。在小说第4回里，所介绍的关东省内等地居民人数是“据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俄国所

出西伯利亚工商业报”。黄克强、李去病在游旅顺大连时，店铺老人诉说民众所受之苦，梁启超夹注为：“著者案：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中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写俄国在东北屯兵情况时，夹注为：“著者案：此乃最近事，实据本月十四日路透社电报所报。”他在揭露俄军糟蹋中国人的实情时，又夹注为：“著者案：此段据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东京日本新闻所译，原本并无一字增减。”并且，在眉批处狄葆贤更加明确地指出道：“此种近事，随处补叙，攻读一书便如读数十种书，处处拿些常识教给我们，小说报之擅长，正在此点。”

对于这种标明出处的注重史实的作法，梁启超也感受到了其中的苦心。“内中所言事实，乃合十数种之报、数种之书而熔铸之者，以数日之功搜辑材料，煞费苦心。”¹⁶可见这种注重史实的学风与矢野龙溪有极大的类似性。

梁启超这一将时事引入小说的作法，有学者称之为“近事体”，并指出，“以时事入小说，自明末即有端倪，然唯有到梁启超的时代，才能如此迅速而又出处分明地将近事采入小说之中。”¹⁷不过，从梁启超的作法与明治政治小说的尊重实学之风来看，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既然学者们认为梁启超这一手法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演义法，又认识到梁启超时代的特异性，究竟它从何而来？笔者认为，梁启超的“史笔”法以及“迅速而又出处分明”的“近事体”，很大的一个源头即来自于明治日本的政治小说。

三 《雪中梅》对《新中国未来记》中“实”的影响

另一部著名的政治小说《雪中梅》对《新中国未来记》中所采用的倒叙手法的影响，此前已经学者指出¹⁸，这里无须赘述。梁启超不仅看过《雪中梅》，而且看的还是日语原文¹⁹。在《雪中梅》第1回“发端”处，作者末广铁肠将自己的名字与自己三个月前发行的《二十三年未来记》、《雪中梅》以及待写的《雪种梅》续

集《花间莺》再度引入该小说之中。《雪中梅》的“发端”就相当于《新中国未来记》的“楔子”。末广铁肠在“发端”中是通过甲乙两个人的谈话来介绍小说事件原委的。

“是这样的。此碑文中有记载先生事迹的《雪中梅》《花间莺》二书，其上面缺一字，多半为‘载’字或‘详’字。若有此书，定能晓得当时之事情，大家都互相问过，但由于时代久远而无人知晓。忽又想起去上野图书馆查找，终于发现其书。于是委托笔耕者用数天抄下《雪中梅》之书。其文章极其有趣，且原样记载谈话情形，记载人情详细。明治二十三年前的政事社会宛如出现在眼前，名士贤女忍受种种艰难，为国会设立而尽力，令时代不同的今人为之感动。您若要看，我已带来。”

“那太好了。什么《雪中梅》铁肠居士著，那与《二十三年未来记》的著者还是同一个人啊。国会开设前的状况定能清楚吧。谁想到正值国会开设一百五十年的庆典之日，能得到如此之古书，真不可思议。哎，目录是汉文。”²⁰

作者接着将《雪中梅》上篇共七回的目录全部抄录一遍。末广铁肠显然是为了使小说起互动作用，借已成为畅销书的《二十三年未来记》轰动日本的效果来提升《雪中梅》及期续集《花间莺》。同时，末广铁肠显然也想以此表现小说“实”的成分。

关于明治政治小说中这种将现在自己正在撰写的小说又引入该小说的作法，梁启超在自己的小说中同样进行了尝试。他在《新罗马传奇》篇首的“楔子”中，就采用了这一手法。

你们有所不知，我闻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什么饮冰室主人，编了一部《新罗马传奇》，现在上海爱国戏园开演。²¹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也同样运用了这一手法。在小说第1回“楔子”处明确地写道：“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报社。（这笔电费却不小）。”在第2回里继续写道：“因横滨新小说报社主人，要将我这讲义，充他的篇幅，再三谆嘱，演成小说体裁。”并且，梁启超还将自己的其它小说中的语句引

入该小说中。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第2回里还写道：

诸君要知道那时的人心风俗吗？请看那《饮冰室文集》里头，有两段子，说道：

（皂罗袍）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到今儿便记不起昨日的雨横风斜。游鱼在釜戏菱花，处堂燕雀安颓厦。黄金暮夜，侯门路賒，青灯帖括。廉船鬓华，望天儿更打落几个糊涂卦。

（前调）更有那婢膝奴颜流亚，趁风潮便找定他的饭碗根芽。官房翻译大名家，洋行通事龙门价，领约卡拉，口衔雪茄，见鬼唱喏，对人磨牙，笑骂来则索性由他骂。

这里所说的“曲子”就是指《新民丛报》第1号“小说”栏中的《劫灰梦传奇》，作者就将其中的两段引入小说之中。这一手法显然比《雪中梅》做得更加大胆，梁启超肯定也是要想使自己的小说和其它作品之间产生互动效应，借此来宣染《新小说》和《饮冰室文集》，同时也力图体现小说中“实”的成分。

类似这样的手法，在以往的中国小说里是找不出可以模仿的样本的。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一做法明显地打上了明治政治小说的影响的烙印。

另外，《新中国未来记》还将当时的人物、杂志等溶入小说之中。如小说中出现了“朱九江、南海康君、浏阳谭先生嗣同、《新民丛报》第一号、《新民丛报》第二号、《饮冰室文集》、《长兴学记》、《仁学》、《时务报》、时务报馆、早稻田大学政治科、上海张园演说会场”等诸多现实中存在的新名词，这些“实”的成分，无疑也是要增加小说“实”的效用。

在《新中国未来记》第4回，梁启超还将拜伦的诗句引入其中。黄李二人在旅顺一家客店里，忽然听见隔壁有人在弹琴歌唱，唱的正是拜伦的两节激励希腊人奋起的英语诗句。梁启超所引用的两句诗分别为拜伦的两部长诗《渣阿亚》（现译为《该隐》）和《端志安》（现译为《唐璜》）中的诗句。梁启超的这一做法，竟

促成了拜伦在中国文学中的正式登场。可以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译拜伦的这两节诗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鼓舞，而它同时也成为后来的学者们竞相翻译拜伦诗的内在动因。而且《新小说》创刊号上还刊登了拜伦的照片，这也同样表明梁启超对拜伦的崇拜，因此将其诗句引入自己的小说之中也并非偶然吧。梁启超之所以这样作，显然他欲借西方的大文人来抬高其小说的地位，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要以“实”的小说来新民和来启蒙民众思想。

像《新中国未来记》这样将当代人物、报纸杂志等写入小说之中的手法，在当时日本的政治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佳人奇遇》中除有“李鸿章、袁世凯、朴泳孝、金玉均”等真实的人名外，还有“三国干涉、辽东半岛、朝鲜问题”等历史事实。《雪中梅》也同样将现实中的报纸、政党等名称引入小说之中，如“《绘入自由新闻》《朝野新闻》、自由党、改进党、井生村楼、正义社政谈会”等。又如《二十三年未来记》中还有“井生村演说会场、国友会、嚶鸣社、自由党、改进党”等。

另外，明治时期的代表性报人福地樱痴的政治讽刺小说《或许草纸》中也同样出现了与当代并存的“实”的成分。如“《东京新报》、《报知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时事新报》、《每日新闻》”以及“鹿鸣馆”等等。福地樱痴在小说第8回讽刺官场考试的奇观时写道：“如果春廼舍朧或者谁能亲眼看到这景象，即使只写实况，一册三百页，也可以写出上中下三册的滑稽小说来。”²²这个“春廼舍朧”即当时大文学家坪内逍遙的号。作者将大量现实存在的地名、报名等以及当时的大文豪的名字都写入其中，无疑增加了小说中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实”的效果。

综上，明治政治小说中“实”的成分是广泛存在的。因此，《新中国未来记》中这种将现实存在的具有真实感的人名、地名、报名等引入小说之中的作法，显然就是来源于《雪中梅》、《佳人奇遇》、《二十三年未来记》、《或许草纸》等政治小说，其中与梁启超密切相关的前三者的影响比较明显。

四 《新中国未来记》对《佳人奇遇》《经国美谈》“虚”的借鉴

《新中国未来记》中除了有上述“实”的成分外，“虚”的效果同样耐人寻味。下面我们通过《新中国未来记》与《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之间的比较予以分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新中国未来记》与《佳人奇遇》之间“虚”的关联性。梁启超之所以决心翻译《佳人奇遇》，那是因为《佳人奇遇》中慷慨论说革命建国的“虚构世界”无疑是打动了梁启超，这也是使他为之所倾倒的要因之一。《新中国未来记》同样表现的是“虚”的世界，我们从《新中国未来记》这一题目就已经一目了然，因为这种寄托理想和未来的“未来记”本身就是“虚”的。梁启超“未来记”的命名及其倒叙手法就是来源于日本的“未来记”式的政治小说，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言及²³，恕不赘言。

笔者将通过小说的内容来考察两者之间的“虚”的关联性。《新中国未来记》虽未完成，但它的内容概要在小说连载前就已经刊出，其中指出：

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种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菲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牙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和平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²⁴

这种“虚”的理想成分又与梁启超亲手所译的《佳人奇遇》的作者柴四朗心中“虚”的理想世界极其相似。在《佳人奇遇》第9卷里，东海散士在给一释师的两千余字的信中，介绍亚洲各国的情况后，阐述了自己的抱负。信中海散士主张“连横东洋列国以颉颃西洋诸邦。”对此，眉批上的汉文标注为“日清同盟之利，东洋连

横之策，说得历历如指诸掌”。信中最重要的一段为：“然则使他日东洋列国连横。助印度之独立，使埃及马岛，绝英佛之干涉，保护朝鲜之独立，与清国连合，远退露人，使亚细亚洲中无纳欧人之鼻息。屹然三分宇内。亚欧美鼎立，偃武仗道，建人生安乐四海平和之基。”²⁵此段汉文的眉批为“何等雄图何等远谋，散士平生之抱负可以睹”。在《佳人奇遇》的翻译过程中任意更改删除原文的梁启超在翻译此段时，除了将东海散士的几句“国权”主张之外，梁启超却都忠实地予以了翻译。可见梁启超对这封信的重视程度，原因在于梁启超对此处所表现的东海散士的理想世界产生了共鸣。

因此，两者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的“虚”恐怕绝非偶然的巧合。两者对未来的抱负和所怀理想都是领先于现实社会，并都暗示现实社会应模仿这种“虚”的“未来记”的模式，可见《新中国未来记》中折射出了《佳人奇遇》里东海散士所宣扬的未来世界的影子。

另外，《佳人奇遇》在人物设计上的“虚”同样是吸引当时日本青年的一大热点。红莲与幽兰二人都是绝世佳人，二佳人对东海散士都敞开了心扉。黄种青年的日本绅士能与黄毛碧眼的白人美女恋爱，这一虚构的世界无疑是感动当时青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衬托流亡志士复国之思，东海散士还设计了一个明末遗臣范卿的形象。另外，登场人物之间没有任何语言障碍，特别是在小说第6卷，佳人幽兰还吟咏了一首汉文长诗《我所思行》，这种无人种差别的大交融，无疑更加增添了小说的虚构性。

《新中国未来记》在人物表现上同样有明显的虚像。如“端云”这一虚构的女子的出现，就是对《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中的佳人形象的受容²⁶。张园演说会场上出现的一些人物，尤其是“西装少年”等都是虚构的成分。并且，从小说概要来看，同样影射诸多虚像，如“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政府”以及“几乎酿成人种战争”等，这些与孔觉民之口所说出的“演成小说体裁”的计划是合拍的。

我这部讲义，虽是堂堂正正的国史，却不能照定那著述家的体例，并不能像在学校讲堂上所讲的规矩。因为许多零零碎碎琐闻逸事，可喜可悲可惊可笑的，都要将他写在里头，还有那要紧的章程，壮快的演说，亦每每全篇录出。明知不是史家正格，但一则因志士所经历的，最能感动人心，将他写来，令人知道维新事业，有这样许多的波折，志气自然奋发。二则因横滨新小说报社主人，要将我这讲义，充他的篇幅，再三谆嘱，演成小说体裁。我若将这书做成龙门《史记》、涑水《通鉴》一般，岂不令看小说报的人恹恹欲睡，不能终卷吗？

另外，《经国美谈》能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除了它注重“实”的成分外，其小说的虚构性更是吸引读者的妙处之所在。前编第 5 回，写志士巴比陀落水后被昔日的家仆救起，以及前编第 11 回写巴比陀与家仆礼温的邂逅。小说前编第 15 至 17 回，作者矢野龙溪巧用美人计的手法，描写巴比陀等志士十二人乔装打扮成十二美人，为奸党的宴会助兴，借此机会刺杀了奸党首领。又如后编第 16、17 回，写隆具大战的情景等等，都是虚构的成分，这些“虚”都大大提高了小说的趣味性。又如在主人公的设置上，志士巴比陀实际上已经和一位高贵之家的女子结了婚，但作者却将其设定为独身²⁷。另一个主人公玛留这一鲁莽的豪杰形象，恰似矢野龙溪所垂青的《水浒传》中的李逵，这显然是一个虚构的主人公形象，对此，柳田泉评价道：“将史实和虚构交错在一起，处理得极其巧妙恰当。”²⁸可以说，《经国美谈》中正史与虚构的结合，是通过各种故事以及伏线等形式来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显然，这是《经国美谈》成为当时畅销书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新中国未来记》中这些“虚”的成分又与明治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过美谈》中的“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梁启超要创作中国自古未有的借以宣传政治思想的政治小说，对于其所推崇的日本政治小说这一绝好样本他一定不会视而不见，其中的影响因素显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 结语

以上就作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其实理论上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前面已言及，梁启超曾看过《雪中梅》。那么他也一定看过的政治家兼政治小说家尾崎行雄所写的位于篇首的序言《雪中梅序》。尾崎行雄在序中对“虚”与“实”作过如下论述：

小说的品类虽然如此之多，概括论之，过于虚者为怪谈，过于实者为历史、传记、学艺之书。巧妙地结合虚与实，可使人不能释开卷之手，且可使人在愉快地阅读之间不觉而受益者，该称之为有用之小说。²⁹

那么，尾崎行雄这种“虚”“实”巧妙结合的小说功利观对欲靠“小说救国”的梁启超来说绝不会漠视的。可以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同样充分考虑到“实”与“虚”结合的技巧问题，在小说中明确表示注重“实”的同时，不忘要“演成小说体裁”，并努力使读者“不复觉其为寓言也”。这与尾崎行雄的“有用之小说”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被认为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三国演义》虽然也是“实”与“虚”的结合体，但它是基于史实而成的历史演义小说，然而《新中国未来记》并非是构建在真实的历史之上的历史演义小说，而是完全构筑于想象和虚构的历史之上的。因此，梁启超要模仿的恐怕并非是中国传统的《三国演义》，而是他所垂青的上述明治日本的政治小说。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梁启超亡命的并非日本，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不知要等待何时。

总之，《新中国未来记》中既有“实”又有“虚”。用“实”来增加政治小说的可信度，进而达到“小说救国”的目的，同时也是在努力通过“实”的成分来抬高小说的地位，使小说摆脱“小道”的阴影；借助“虚”来吸引读者，阐述未来建国的政治理想。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实”与“虚”的艺术结合，在与梁启超密切相关的日本明治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雪中梅》中都能找到其原型，其中所受到

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换言之,《新中国未来记》中“实”与“虚”结合的母体就是梁启超所盛赞明治政治小说。梁启超正是充分利用身处日本的有利条件,努力吸收明治政治小说中的营养成分,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到了自己政治小说之中,《新中国未来记》中“实”和“虚”的描写是梁启超对其所标榜的日本政治小说借鉴的又一见证。

另外,《新中国未来记》中所汲取的新式创作手法对其后的《新中国》、《新纪元》、《未来世界》等诸多小说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 1 王学均《问题小说的发端——新中国未来记及其群类》《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12月,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1月。
- 2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
- 3 《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自由书》《清议报》第26册1899年9月;《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 4 同上注。
- 5 松本幸子《政治小说之论》樱枫社1979年3月,第109页。
- 6 《日本新闻》1892年1月31日。
- 7 参照陈平原前揭书第184页的注释1。
- 8 《新中国未来记叙言》《新小说》第1号,本文中《新中国未来记》的引文均出自上海书店1980年复刻版《新小说》,以下不逐一注明出处。
- 9 关于梁启超与矢野龙溪间的交往,参见寇振锋《清末〈新小说〉杂志上的〈历史小说洪水祸〉——以对明治政治小说〈经过美谈〉的受容为中心》,《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第17辑2005年3月。

- 10 小林智贺平校订《经国美谈》岩波书店 1969 年。以下不逐一标出。
- 11 这里的片假名‘イ’是指文中所示的起止符号，原文无单引号。为了区分起见，为笔者所加。以下字母同。
- 12 同注 9。
- 13 前田爱《经国美谈·补注》，《明治政治小说集》角川书店 1974 年 3 月，第 450 页。
- 14 平冈敏夫《日本近代文学史研究》有精堂 1969 年 6 月，第 117 页。
- 15 夏晓虹前揭书第 60 页。
- 16 《新小说第三号之内容》《新民丛报》第 25 号 1903 年 2 月。
- 17 欧阳健前揭书第 29 页。
- 18 陈平原前揭书第 41 页，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的革命和变革的理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和明治日本》みすず书房 1999 年 11 月。
- 19 陈平原前揭书第 41 页。
- 20 据日本近代文学馆 1971 年复刻版《雪中梅》。
- 21 《新罗马传奇》《新民丛报》第 11 号 1902 年 6 月。
- 22 据柳田泉编《福地樱痴集》筑摩书房 1966 年 6 月。
- 23 夏晓虹前揭书第 221-224 页，山田敬三前揭论文，李庆国《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与日本明治初期的未来记小说》《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41 号 2005 年。
- 24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 25 据《清议报》第 28、29 册所载梁启超译《佳人奇遇》。
- 26 寇振锋《〈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志士和佳人——以对〈经国美谈〉〈佳人奇遇〉的受容为中心》《多元文化》第 4 号 2004 年 3 月。
- 27 龟井秀雄《纂译和文体——〈小说神髓〉研究 6》《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通卷 73 号 1992 年 2 月。
- 28 柳田泉《政治小说研究》上卷，春秋社 1967 年 8 月，第 191 页。
- 29 同注 20。

（作者为日本国立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振声）